

客家学术研究丛书

主编 陈春声 罗 勇 王 东

走进客家历史田野

地方社会与文化传统

杨彦杰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客家学术研究丛书

主编 陈春声 罗 勇 王 东

走进客家历史田野

地方社会与文化传统

杨彦杰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客家历史田野：地方社会与文化传统 / 杨彦杰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4

(客家学术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11203 - 9


I. ①走… II. ①杨… III. ①客家人—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①K281.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5101 号

ZOUJIN KEJIA LISHI TIANYE: DIFANG SHEHUI YU WENHUA CHUANTONG

走进客家历史田野：地方社会与文化传统

杨彦杰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肖风华

出版策划：钟 菱

责任编辑：钟 菱 王红星

插 图：曹知博

印章篆刻：林清书

装帧设计：吴长乐 金 彤

责任技编：周 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0.25 字 数：299 千

版 次：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5240

ISBN 978-7-218-11203-9



9 787218 112039 >

世界客家文库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小丹 吴伯雄 吴德芳 黄华华 曾宪梓

世界客家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桂科 杜传贵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 河 应中伟 张伟涛 张燕卿 萧宿荣

执行主编 肖风华 钟永宁

编辑部主任 钟 菱

世界客家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陈春声

执行主任 陈支平 曹树基 罗 勇 王 东

学 术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幼楠 王琛发 庄初升 刘大可 刘义章 刘正刚 刘永华

刘志伟 刘道超 刘晓春 严修鸿 李如龙 杨宏海 杨彦杰

肖文评 吴庆洲 吴良生 张 侃 邱国锋 陈世松 陈弘君

劳格文 周建新 周雪香 郑振满 房学嘉 胡铁球 黄志繁

梁浩翰 谢有顺 谢重光 谭元亨 潘朝阳



杨彦杰 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1992 年被评为副研究员，1996 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历任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科研组织处处长、客家研究中心主任、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馆长等职，现兼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是台湾史、客家传统社会与文化；著有《荷据时代台湾史》一书，曾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发表客家研究的论文数十篇。

从 1992 年开始，杨彦杰与劳格文（John Lagerwey）合作，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区，尤其是福建省西部从事客家传统社会与文化的田野研究。十余年来这项国际合作计划编辑出版“客家传统社会丛书”30 种，其中由本人撰写或主编的专集 10 种（含诏安专集 2 本）。

《客家学术研究丛书》总序

清嘉庆十三年（1808），执掌惠州丰湖书院的徐旭曾，受广东东莞、博罗一带“土客械斗”的触动，招集院内诸生，讲述客家源流及其语言文化。徐氏的讲述，后经门人整理，以《丰湖杂记》为名，收录在《和平徐氏族谱》之中。^①在客家研究的学术史上，徐氏的这份讲述，“虽文仅一千余言，然颇能简明得要，且为最先提述客家源流问题的作品”^②，故而一直被视为研究客家历史文化的先声。

以《丰湖杂记》为起始，客家研究已走过200多年的历程。200多年来，围绕着客家历史文化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可谓丰富而又饱满。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民族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纷纷介入，在多学科交叉与整合背景下的“客家学”建构，正在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实践。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在200多年来的客家研究进程中，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前者在继承和发展徐旭曾以来客家籍传统文人士大夫对于乡土历史与文化认同的集体记忆的同时，又立足于现代的学术规范，“以科学之方法，为客观之论述”^③，从而首次以严谨的学术理路，对客家历史与文化作了系统的梳理和厘定，并得出了客家是汉民族中的一个系统分明的“民系”（或“支系”），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客家是由于

① 详请参阅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第297～2199页。

②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书藏社，1933，第2页。

③ 朱希祖：《客家研究导论序》，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朱序，第1页。

历史上多次移民运动而引发的北方汉人南迁的产物等一系列重要结论。至于《客家源流考》，则主要是以客家谱牒文献为基础，进一步夯实前书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继罗香林先生之后，海内外学术界又推出了大量的有关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果。不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类后续的成果除了拾遗补缺之外，总体上都没有超过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的水平。一直到了90年代之后，随着民族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众多社会科学学科的加入，特别是随中国改革开放而来的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日趋频繁和深入，反思罗香林先生以来的客家研究传统，突破已有的以历史源流考证、方言特征描述和民俗事象举证为旨归的有限格局，一种全新的客家研究范式才开始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正因为如此，在学术史的分期上，我们可以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客家研究，笼统地归入由罗香林先生所开创的学术传统。就研究范式而言，这一传统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从中国历史的整体进程出发，通过梳理北方汉族人口的几次大规模南迁，来辨析客家的渊远流变，再对客家的民族归属问题进行剖判；其二，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上，主要是以零星的正史材料和地方志文献为经，以大量的客家谱牒文献为纬，通过这种经纬交织的文献铺陈方式，“再现”客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

“汉族移民史”范式主导下的客家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承传与发展，积累了大量的有关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知识。但是，从学理的层面看，这一研究模式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严重不足。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这种宏观的“汉族移民史”研究理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同一部汉人南迁史背景下南方汉族又分化成不同方言文化群体的这一重要事实。众所周知，在今天的南方汉族人群中，不仅有客家这个群体的存在，而且还有吴、湘、赣、闽、粤等诸多汉语方言文化群。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在北方汉人南迁的这一共同背景下形成和发展

起来的。这一事实表明，仅仅从汉人南迁这个单一的移民史维度，是无法彻底厘清客家之所以成为客家、其他南方汉语方言群体之所以不同于客家的历史文化缘由。其次，这一研究路径在整体上漠视了赣南、闽西和粤东北这片毗邻区域（笔者称之为“赣闽粤边”）历史文化景观的独特性，漠视了该区域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与客家形成及发展之间的种种内在关联。数十年来，在“汉族移民史”的研究理路影响下，作为客家赖以生存与发展地理基础的“赣闽粤边”，一直以来只是一个“配角”，是接纳北方人口南迁的“容器”，是承载随北方人口南下而来的中原文化意识、文化观念和文化事物的“集装箱”。在这种“赣闽粤边”完全“不在场”的叙事模式下，客家就是一群“中原衣冠”辗转南迁、“雅不欲与土人相混处”^①的“中原音韵”承传者、“诗书礼乐”传播者和“爱国保族思想”的勇敢实践者。^②至于赣闽粤边区域内部的族群关系、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以及该区域与周边其他区域的互动等各种因素，对客家这个特定的区域性语言文化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一叙事模式之下，则一概阙如。

就主要研究策略来看，“汉族移民史”研究理路，主要立足于中国历史的宏观发展进程，经由对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北方汉族人口南迁过程的梳理，来厘清客家人的来龙去脉，一方面借以证明客家是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彰显客家人根在中原和忠义爱国的群体特性。显而易见的是，这一研究的核心关怀，一方面是力图化解自19世纪以来华南地区日益强化的客家人与周边其他语言文化群体之间的矛盾与紧张，另一方面又与20世纪初叶以来华南地区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相呼应。在这样的研究策略和核心关怀指导下，作为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晋室南渡、安史之乱、宋金对峙、蒙元南下以及清军入关等等，遂成为理解客家起源与发展的几个最主要的历史情节。相应地，所谓“中原衣冠”“义不帝秦”“诗礼传家”“崇文重教”等，便成为客

^① 徐旭曾：《丰湖杂记》，罗香林编：《客家史料汇编》，第299页。

^② 详请参阅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四至第八章。

家人或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围绕着客家历史与文化所建构的一整套叙事模式，包括在这一叙事模式之下所积淀起来的有关客家历史与文化的各种知识，都与上述这套话语体系密切相关。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纷纷介入，特别是经过中国史研究从原先的“宏大叙事”向中观层面的“区域史”路向的转变，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开始了对罗香林先生所开创的学术传统进行反思与检讨。正是在这一反思与检讨的过程中，客家研究进入了学术上的“突破”期。

这一时期所谓的“突破”，尽管体现在问题意识、研究理路、概念工具乃至具体方法等各个不同的面向，但由此前“汉族移民史”的宏大叙事模式，向“区域社会史”叙事模式的转向，则是这一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尽管就严格的意义而言，最近二三十年来所问世的客家研究成果，丰富而又驳杂，以至于我们很难用某种统一的理论范式来加以归类；但是，把客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以及客家文化的类型特征放置于特定的区域社会史的脉络之中，从区域社会的发展过程、人口流动、族群关系、生计类型、贸易网络、区域互动等各个不同角度，来理解客家这个特定的方言文化群体的形成与发展，辨析客家文化与周边其他区域文化的异同，则是这一时期众多研究者的共同取向。在“区域社会史”的脉络下，客家这个地域性的语言文化群体，就不再是一群行色匆匆的北方来客（及其后裔），而是赣闽粤边地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研究的整体理路，是以赣闽粤边这一特定的地理范围及其相邻区域为基础，揭示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因素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构成区域历史或区域文化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及作用。它重在从区域内部的人地关系、族群关系以及该区域与周边其他区域的互动过程中，来理解地域社会的类型及其特征。与以往那种宏观的汉族移民史研究理路相比，这一研究路径所开凿出的诸多研究课题，所发展出的各种研究方法，所凝练出的各种理论诠释，不仅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

于客家历史与文化的认知，而且为推动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向纵深的发展提供了丰沛的学术资源。

正是基于对百余年来客家研究学术史的以上认识，我们在编辑这套“客家学术研究丛书”时，把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作为整套丛书的第一种。这样的结构安排，既是对百余年来客家研究学术史的尊重，更是对罗香林先生这份学术遗产的格外珍视。而整套丛书所希望重点呈现的，自然是最近若干年来客家研究界所贡献的一系列最新成果。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客家研究从19世纪中叶以来，就是一项世界性的学术事业。从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到当代欧美和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界，关于客家人、客家历史及文化的研究，一直就未曾中断过。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客家研究的发展与“突破”过程中，一些来自于海外的学术成果，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着手编辑这套丛书时，我们曾考虑将海外学术界的重要成果加以收录。然而，由于这些成果大都是以外文出版或发表的，短时间内很难一一译成中文。故而，除梁肇庭先生的著作外，其他的成果暂时都未能编入丛书。这当然是非常遗憾的。我们殷切地期待译界朋友能尽快地将这些成果系统地译过来，一方面以嘉惠整个学林，另一方面也让这套丛书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和饱满。

是为序。

王 东

2018年2月1日

前 言

运用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探讨中国社会文化史，是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新发展。1992年，我和劳格文（John Lagerwey）开始合作探讨客家的传统社会与文化，自然而然也踏进了客家这块历史田野。

我和劳格文都不是客家人，我们选择在闽粤赣边这片客家人传统聚居区做田野研究的理由，最主要的是这片区域以前学术界关注较少。尽管客家人在海内外相当有名，并早已有研究成果问世，但以前人们对客家人的了解最多是在粤北尤其是梅州，而闽西、赣南等大片区域却很少有人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东风正吹向这片山区，闽粤赣边正面临巨大的社会变迁，在这片即将被“扰动”的传统区域做社会历史调查，可以说是时不我待了。

我们的关注点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文化传统，因为普通百姓的文化传统是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他们年复一年的神明庙会、扫墓祭祖、迎神打醮、传说故事乃至生产技能、生活禁忌等，这些看似平常的民众社会生活及其文化传统既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同时也是地方社会在历史延伸中不断发生作用的集体智慧和文化基因。从地域人群的角度说，这种由底层民众集体呈现的文化传统，正是一个地方人群有别于其他地方最值得关注的文化特色。我们的调查以宗族和民间宗教为主，同时也注意当地民众的传统经济活动。这些大量的田野调查成果，包括我撰写的《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和编辑的几本闽西专集，都收录在劳格文主编的《客家传统社会丛书》之中。

除此之外，本书收录的主要是1996年以来我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的论文和演讲稿。由于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和地点都比较分散，集中起

来阅读相对不便。而参加会议的主题也各不相同，因此本书的编排大致将这些文章分成五类：庙会与地方社会、宗族建构与文化传统、祖神崇拜与畲族文化、妈祖信仰及其变迁、饮食文化的特色。这样的分类只是为了使每个版块的文章显得主题相对集中，但并不表示每篇只论述一个问题，其实有的文章所探讨的地方社会，回应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神明庙会 是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通过对神明庙会的观察和理解，可以让我们认识一个地方的历史演变轨迹、各种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底层社会的运作规则等。客家人聚居的地方是一片山区，这里与沿海地区常见的神明崇拜模式不同。一般而言，客家人没有祖庙，没有分香、谒祖进香等观念，有的地方的神明崇拜根本就没有庙宇。宁化县治平乡的华光大帝“轮祀圈”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从明朝就开始的轮祀系统，包含治平中心区的十个“乡”，每乡轮流供奉华光大帝一年，周而复始。整个轮祀圈实际就是一个宗族联盟，并由此设立了代表会制度。而类似的神明崇拜模式在连城县等地也可以看到，而且都有汉畲杂居的背景。它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以前学术界常用的祭祀圈、信仰圈等概念其实只是从某些地方的传统概括出来的，并不可以过度使用。一个地方的神明崇拜模式往往与当地的人文历史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神明作为地方庙会集体崇拜的对象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宁化县夏坊的“梅山七圣”更像是赣南、闽西北地区古老遗存的雉神崇拜。而这些负责驱邪赶鬼的“七圣”是由弱势群体装扮的，它的兴起不会超过清末，但却最终取代了大姓的神明成为众人祀奉的对象。强弱派系之间的互动，以及庙宇管理、庙会运作机制的演变等都可以从庙宇账册的记录中显现出来。长汀县濯田镇的“霸王”信仰同样存在着取代早期“五通”祭祀的历史过程。这个兴衰更替的过程与濯田水路码头的变迁、商业贸易的发展、宗族势力的崛起和各种利益关系的竞争等因素密切相关，年复一年的“霸王”庙会成为当地新移入人口与土著居民互动交流并逐步融入地方社会的文化媒介和平台。泰宁县开善

上保的民俗宗教更倾向于佛教传统，当地民众有装塑佛像的习俗，并把这些奉献都记载在族谱里。而当地民众共同祀奉的神明同样也是从历史承续下来的。不同宗族利用他们各自的文化资源在展示自己，同时共同塑造着地方文化传统；而官府则利用这座村庙宣讲圣谕，当地知识分子扮演着传播国家意识形态的角色。地方神明庙会就是一个浓缩历史与现实的社会舞台，通过观察与理解，展示的是地方社会复杂、多元、长期互动的历史画卷。

与华南各地一样，客家的宗族制度普遍形成于明代。客家人人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中原，并在构建宗族制度的过程中不断型塑自身的文化印记。宁化伊氏是当地古老的姓氏之一。他们的族谱强调伊氏祖先来自开封，是由于唐朝末年黄巢起义的社会动乱才迁徙南下的。从清代至民国，这个宗族经历了自下而上的整合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族人对汴京、北宋皇帝的历史情感通过伊公的故事不断得以强化和展示，同时也日渐成为当地各姓居民共同的文化遗产。清流县东坑陈氏的源起也被追溯到宋代。而陈氏保留下来的大量宗族文献显示在这个宗族内部曾存在各种各样的祭祀组织。这些被称作“会”或者“社”的祭祀组织并不是完全按照个人出资多少自由组合成的，而是与宗族内部的“房”和国家的“甲”有密切关联，这与以前我们认识的神明会组织原则并不太一致。在这个宗族内部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文化传统，就是他们每年都要祭祀临水夫人和“姑婆”，而这两个被赋予宗族血缘色彩的女性神明是从地方崇拜的神明转化而来的，特别是“姑婆”，她原来是武夷山的一位得道高僧，即辟支古佛。

客家人在明清时期大量移往中国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各地。那些在祖居地形成的宗族文化传统，也会随着族人外迁的脚步向外播展，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继续发挥作用。诏安县霞葛江氏的宗族文化传统是强烈的风水观和有关鸭子生双黄蛋的地方传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观念和传说故事都随着族人带到台湾，并在台南构建宗族的过程中很自然地成为他们的文化资源。永定县是闽西著名的侨乡。湖坑李氏族人在清乾隆年间大量移往东南亚各地，他们带出的村社保护神观念与

当地文化结合后又传回祖地，成为湖坑李氏族至今仍热烈崇奉的“暹罗国汉民主本头公王”。这些外迁族人所携带的文化基因，包括乡土知识、行为习惯、祖先和神明崇拜观念等，就是我们在客家祖地研究中不断理解的宗族文化传统。而这些文化传统在移民向外延伸、拓展和互动交流的过程中，显示了极强的适应性、生命力和创造力。

客家人崇拜的神明各种各样，有一类神明是从自己的祖先演化而来的，我们称之为“祖神”。这种祖神在华南不少地方都有存在，但在闽粤赣客家地区出现的大部分都有民间道士（或闾山或梅山或茅山）的背景，并且都有与社公斗法的故事在流传。闽粤赣边原是畲瑶族的居住地，闾山道教又与畲族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客家地区的祖神崇拜实在含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清流县东山萧氏就是这样一个并不常见的例子。萧氏自称是唐朝名臣萧瑀的后代，但查考正史却与这位历史名人无关。他们的语言、节庆、祭祖、游神等都与一般的客家人相同，但在口传故事、祭祀仪式、饮食习惯和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存在畲瑶族的文化遗留，因而更像是土著居民被同化而进入客家群体的。这种逐渐汉化的过程可能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宋元之际出现的有法术的祖先似乎说明已经与汉人道士接触交融，而明朝开始兴建的萧瑀庙则明显是进一步儒家化的结果。这个案例从一个侧面反映汉族先民进入闽粤赣边区以后逐步与土著居民融合最后形成客家的长时段变迁历程。如今在客家地区存在着尊崇女性祖先的传统，“婆太”的地位很高，不少地方（包括台湾）女性祖先开基的故事时有所闻。这种比较尊崇女性的社会习俗及其观念也有受畲族文化影响的背景。

客家地区的神明大部分是本地的，但也有一些来自外部世界，妈祖就是其中一例。来自沿海地区的妈祖信仰传到闽西山区以后，主要成了当地村落或城关社区的保护神，尤其与妇女儿童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妈祖信仰的传播来自商人和船运活动，因此河流走向是一条重要的纽带。但是在比较长汀与宁化城关的妈祖庙会则发现：长汀包括整个汀江流域的妈祖信仰来自沿海，它的源起与南宋的海盐运输密切相关；而宁化城关的妈祖是从陈、林、李三位夫人的林氏演变而来的。宁化属于闽江水系，当地的临水夫人信仰特别盛行，而保护船只航行

安全的最主要神明是拿公。因此，要深入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传统，山形地貌、河流走向是基本要素。河流是传统社会重要的运输通道，而普通百姓日常行走的山间小路也是物资流动、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这些小路往往是官修地方志没有记载的，但却是普通百姓耳熟能详、日常活动的基础。山川地势制约着人们的活动走向，也规范着人流、物流乃至信息流通的基本格局和方向，最终造就了一个区域相对统一的社会文化特色。

饮食是体现客家文化的一个侧面。客家人的饮食文化既相对统一又各有不同的区域特色。而他们的食材取用、烹饪习惯、聚餐传统、宴客礼仪乃至饮食禁忌等，则是结合地方物产、人群互动、内外交流等因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累积而成的。这种逐步累积的历史过程并不容易描述，但有些因素则相当明显。如宗族制度的建立和国家礼仪的推行，使得客家人特别讲究宴饮规矩和座次礼仪；而畬族文化的影响以及山区生活环境的制约，又使得客家人的某些食物、饮料的制作存在着自身的特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的“水土”不单指自然环境和物产，也包括人文历史背景；而在此基础上养育的“人”才具有社会文化意义。客家文化传统就是来源于客家人所处的山区环境、畬瑶族文化的影响，以及对内对外交往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我要感谢曾经与我们合作，为我们田野调查提供帮助的各位客家乡亲。其实，客家人的历史就存留在这些老人家的记忆之中，离开了他们，以往没有被记录的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和文化传统就很难得以呈现。

本书收录的文章，其田野资料都是我和劳格文在将近二十年合作期间共同取得的。我们一起分享着调查的成果，也一起分享着合作研究带来的喜悦和收获。文章的写作由我个人完成，不足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杨彦杰

2018年1月26日



客家
文庫
目錄

前 言

庙会与地方社会

- 轮祀圈：宁化治平的华光大帝崇拜 / 2
- 夏坊的宗族社会与“梅山七圣”崇拜 / 26
- 庙会与地方社会：长汀濯田的霸王信仰 / 66
- 开善上保的宗族社会与民俗宗教传统 / 91

宗族建构与文化传统

- 宁化伊氏的宗族构建与中原情结 / 120
- 东坑陈氏的宗族组织与神明崇拜 / 135
- 诏安县霞葛江氏宗族及其文化传统 / 156
- 闽西客家与南洋的关系——以永定湖坑李氏为例 / 169

祖神崇拜与畬族文化

- 华南民间的祖神崇拜 / 192
- 东山萧氏的宗族文化及其特质 / 202
- 闽西畬族的女性崇拜及其意义 / 223

妈祖信仰及其变迁

山区的妈祖：一个宗族与村落的保护神 / 230

从长汀、宁化城关庙会看闽西的妈祖信仰 / 246

长汀城关妈祖信仰的变迁 / 257

饮食文化的特色

客家菜与客家饮食文化 / 276

客家人的饮食禁忌 / 294

附 录

合作与交流：华南客家研究的经验和体会 / 302

